

《说文》重文研究综述

——《说文》重文专题研究之一

王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通过对《说文》重文研究历史的回顾和总结, 指出前贤对《说文》重文的研究, 多注重于利用微观研究的方法, 从重文历史类型的特殊性出发来揭示部分重文的属性和特点, 基本上还没有来得及从重文体系出发, 建立与正篆对照关系的坐标, 在重文与正篆对比的过程中来分析全部重文现象。因而, 确定《说文》重文研究的切入点为: 在与《说文》正篆相互对应关系中, 研究重文系统各类别间的存在前提, 归纳重文的结构类型及其特点, 总结汉字发展的优化规律。

关键词: 《说文解字》; 重文; 综述

中图分类号: H161

文献标识码: A

在汉字研究历史上,《说文》贮存的重文材料一向为各家所关注。所以,在进入《说文》重文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前此已有的《说文》重文研究的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作一个清理,了解已经取得的进展,以便认识今天进行该课题研究的意义和空间所在:找到《说文》重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础。

《说文》重文研究盛行于清代。自有清至近代有关《说文》重文研究的论著,随着《说文》学研究的盛行而代不乏人。像清代萧道管的《说文重文管见》、曾纪泽的《说文重文本部考》、俞正燮的《说文重文考》,近代如朱孔彰的《说文重文考》、陈衍的《说文举例采证重文管见》、刘盼遂的《说文重文疏叙》、王时润的《说文重文释例》、伯雅的《说文重文例释叙例》、沈兼士的《汉字义读法之一例——说文重文之新定义》等论著,都针对《说文》重文不同方面做过一些研究。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近人马叙伦的《说文》重文研究。马氏《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根据当时古文字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考证《说文》形体来源的同时,对《说文》重文从形音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说文解字研究法》是马氏为写《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所作资料准备时总结出来的《说文》研究条例,共七十二篇。其中涉及《说文》重文的内容就有:“说文篆文”、“说文古文”、“说文籀文”、“说文奇字”、“说文或字”、“说文俗字”、“说文今字”、“《说文》正文重文异字”、“《说文》异部重文”等9篇¹。马氏以《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为基础,对《说文》中的重文分门别类,专节论述。可以说,这是有清以来对《说文》重文研究比较全面而有系统的总结。

关于《说文》重文的分类研究,前贤对《说文》重文中的籀文和古文讨论得比较多。清代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是清代研究《说文》古籀的第一部书。其用古文字资料来比附《说文》中之古文、籀文,成为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清代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是根据古文字补正《说文》的创始之作,吴书已经具有综合性古文字工具书的性质,近代各种出土文字汇编正是在吴书的启发下产生的。后有近人孙海波《说文籀文古文考》、周名煊《新定说文古籀考》、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马德璋《古籀文汇编》、徐文镜《古籀汇编》等,这些著作多是采录甲骨文、金石文字或其它古文字来合籀文。王国维作《史籀篇疏证》,“掇录籀文而考之”,“据甲、金文为之爬梳,辞赅义博,其功盖不下于三仓”²。王国维又有《说文所谓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

文说》等，对《说文》重文中古文和籀文之时代考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胡光炜《说文古文考》，舒连景《说文古文疏证》、孙次舟《说文所称古文释例》、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等，均具列古文形体，参验以甲骨文、金文及六国文字对《说文》重文中之古文加以疏通证明。曾宪通的《三体石经与〈说文〉古文合证》指出《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乃是同一系统的文字，与战国文字实为一家之眷属。作者利用二者合证而得出古文不限于壁中书、《说文》篆文中多古文、古文中多假借、部分古文形体奇诡嬗变之迹可寻等四项结论，搞清了很多疑难不清的问题。以下我们将对《说文》重文研究中的主要方面做些介绍。

一、《说文》中之古文研究

许慎《说文·叙》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

以《说文·叙》来看，许慎所说谓“古文”，从时间来说，从黄帝史官仓颉造字起，一直到西周宣王时太史籀著十五篇《大篆》之前，这段时间通行的文字，叫做古文。段玉裁注《说文》即据此说。因此有说：“凡言古文者，谓仓颉所作古文也。”从来源来说，是指孔子写的六经跟左丘明述的《春秋传》。因这些典籍都是用古文写的。孔子写的六经，指的是孔壁中的经书；左丘明述的《春秋传》，指的是西汉初年张苍献的《左传》。《说文》里的古文，来源于汉世所存的古文经传，其中，特别是孔壁古文和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汉人，包括许慎在内都相信壁中书出于孔子手书，《春秋传》出于左丘明手书，并认为用以书写的文字是比春秋更早的字体。但据后人研究的结果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清人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中根据《说文》古文多与较早的金文不合而有些字形却与战国文字相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末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中赞同吴大澂观点，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故……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³王国维明确指出：《说文》所收古文实际乃春秋战国之世流行于东方六国文字。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用当时通行书体。王国维在《说文所谓古文说》一文中指出：“然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文字”⁴。王国维又作《桐乡徐氏印谱序》，取六国时刻铸在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字形，与《说文》古文相比照，证明它们同出一系，均为六国通行文字⁵。马叙伦认为：虽曰古文，不必为最初之文，而实秦篆以前通用之文字。他在《说文解字研究法·说文古文》中说：“盖孔壁古文，书有非一时，或同书而有异本，皆未可定。凡古文者，非谓其文造自仓颉，形必古于大小篆。然则虽曰古文，不必为最初之文，而实秦篆以前通用之文字。至其一字多形，则由列国殊书所致。盖所谓文字异形者，不待七国时为始然矣。”⁶商承祚在《说文中之古文考》中指出：“古文者，壁中书也。许氏所据，尚得其真，屡经传抄，遂多失型。”“文字由进化而推衍，愈后则愈繁，故籀文详于古文，篆文详于籀文。”⁷曾宪通在《三体石经与〈说文〉古文合证》中指出：《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乃是同一系统的文字，是导源于商周而通行于战国的文字⁸。作者探讨了三体石经古文，其上有古文 1000 多个，去其重复，得单字为 440 文，与《说文》古文与甲骨文、金文六国文字相比较提出以下观点：①石经古文同于《说文》古文者七十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六。②同于《说

文》篆文者一百六十五文，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五。③同于甲骨文及金文者八十七文，约占总数百分之二十。④同于六国文字者五十六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三。⑤石经古文中形体讹别不知所出者六十五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五。从①②可看出石经古文中约有半数以上与《说文》相同，但同于古文者少而同于篆文者多，由此反证《说文》古文远非古文的全部，它在古文总体中大体只占百分之十几比例。从③④可以看出，石经古文中约有三分之一异于《说文》古文而与甲骨文、金文及六国文字相合，有一部分古文与甲骨文、金文及小篆不合，而独与战国文字血脉相通，由此证明石经与《说文》一系的古文，确是导源于商周而通行于战国的文字。⑤是向来古文怀疑论者所攻击的目标，由于它形体讹别过甚，不易明其嬗变之迹，故往往以古人作伪而加以否定。《说文》古文中这类所占比例与石经古文大抵相同，其中不少已被证明为战国文字的别体。随着战国文字的不断出土，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中这类似乎不可知的文字，将逐步得到合理的解释。接着作者指出《说文》古文与三体石经古文是流行于汉魏间的前代文字，二者证明，又互为补充。所以作者利用二者合证而得《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乃同一系统的文字，它们与战国文字实为一家之眷属⁹。

关于《说文》古文字数究竟有多少，历来各家说法也不尽一致。据《说文》里重文注明“古文”的统计，明·杨慎《六书索隐》说“其所载古文三百九十六”；清·蔡惠堂《说文古文考证》谓许书著录古文“四百余字”；王国维《说文所谓古文说》计重文古文五百许字。因杨、蔡、王均未具列古文字，所以不知其取舍有何不同。其后，胡光炜《说文古文考》收录古文字六百一十二文，舒连景《说文古文疏证》收录古文字四百五十七文，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收录古文字四百六十一文。以三书相校，颇有异同，而所得字数，又与杨、王二家迥异。各家的说法不一，主要是由于除许慎在《说文》中已注明××为古文外，其它哪些属于古文，历代学者持有不同看法。曾宪通在《三体石经与〈说文〉古文合证》中认为：见诸重文中的古文数，计四百二十九文，这是《说文》古文的基本数。见诸《说文》正字中之古文，约有三种情况：①正字下别出篆文和籀文，则正字为古文；②正字下别出篆文，则正字非籀文即古文；③正字下别出籀文，则正字兼有篆古。此三项由于各家掌握标准宽严不一，所计古文数亦各有差异，这是导致对《说文》中古文统计字数不一的主要原因。总之，关于《说文》中的古文数，目前尚难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曾宪通说：“无论如何，可以将见之于重文中的古文及下出篆籀之正字二者作为《说文》古文的基数，下出篆文或下出籀文的正字是否即为古文，则需有其它证明方能最后确定。至于据《说文》本身说解及有关字书补出的古文，虽与今本《说文》有所不同，但他们各有凭据，当与其它古文具有同等的参考价值。”¹⁰

二、《说文》中之籀文研究

许慎《说文·叙》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然而，籀文为什么得名为籀？历代对此颇有争议。按汉代人说法，因籀文是《史籀篇》中的字，而《史籀篇》是周宣王时太史名籀的人所作，因而得名，这一说法相沿最久。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提出新说：因为《苍颉篇》首句是“苍颉作书”，所以推测《史籀篇》首句也必是“太史籀书”，这里“籀”字是“抽读”的意思，不是人名。又说：“籀文非书体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为三体，谓籀文变古文，篆文又变籀文。不知自其变者观之，则文字殆无往而不变，故有一卷之书而前后异文，一人之作而器盖殊字；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文字之形与势皆以渐变，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许君谓史籀、大篆与古文或异，则固有不异者。且所谓异者，亦由后人观之，在作书时亦只用当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无所谓创作及增省也。”¹¹王国维认为“籀文”不是书体之名，而只是指取材于“史籀”一书，故谓之籀文，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关于籀文的时代和使用地域，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说：“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

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¹²”他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说：“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原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铲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观传世秦权量等，始皇廿六年诏后，多刻二世元年诏，虽亡国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则当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灭六国以至秦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叙》所言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¹³”因为籀文的特点为周宣王时的汉字所没有，而同地下出土的战国时文字相合，因此，王氏的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也有持不同政见者，容庚就不同意东西土文字分用说。他在《文字学形篇》里说：“王国维别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今以彝器证之，齐鲁之彝器文，与秦固无大异，古文之异于秦者，并异于齐鲁，不能谓为东土文字如是也。六国遗器中……皆不尽与古文相同。”¹⁴后来，郭沫若更进一步提出：据信阳墓中的文字有两种字体看来，可以得出一种新的说法，便是自西周以来通行于各国统治者之间的文字有一种正规的体系，而通行于各国民间的文字又别有一种简略急就的体系，可以称为“俗书”，寿县楚器铸款与刻款文字也是两个体系。兵器铭文和印玺则多用俗书¹⁵。赵卫的《说文籀文研究》是近期研究《说文》籀文的一篇论文。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对《说文》中之籀文形体结构作了分析与探讨。其结论如下：“因《史籀篇》而得名的籀文是源于殷周甲、金文，并在此基础上整齐、规范了的古文字，其书写风格和形体结构近同于西周晚期的克器、颂器、虢季子白盘和春秋战国秦器上的铭文，所以我们推断：籀文的使用年代主要在春秋末年和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六国用的古文，是籀文在民间的一种变体，秦国用的小篆，也是在籀文基础上演变了的一种文字。秦统一六国之后，废除了‘不与秦合’的六国古文，对原来秦国通用的籀文和小篆加以改造，从而使其发展成为标准的小篆，实现了‘书同文’的目的。”¹⁶

《史籀》十五篇到了东汉初年只存了九篇，十五篇共有三千字，当时至多存二千字。到了晋代完全亡佚，所以现在所传的籀文除了石鼓文几百字外，只有《说文》所收的籀文。清人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小学类》中有《史籀篇》一卷，其书采取《说文》重文中之籀文 219 字，又《玉篇》所引“籀文”而为《说文》所遗者 13 字，共得 232 字；叶德辉《说文籀文考证》辑徐铉定本《说文》所引籀文 210 字，再加上其从子叶启勋补遗 4 字，计 214 字；王国维《史籀篇疏证》辑《说文》所引籀文 223 字，加重文 2 字，合计 225 字。三家辑录之字互有异同。启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统计为二百二十五字；赵卫在《说文籀文研究》中统计为 214 字；潘玉坤在《籀文字数考索》中统计籀文总数是 224 字，内含重文 2 字。潘氏在《籀文字数考索》一文中说：“《说文》明确标注‘籀文’和‘史篇’的只有二百二十余字。一般认为，《说文》中的籀文不止此数。这涉及到《说文》编排小篆、古文、籀文三种字体的体例问题。《说文·叙》讲，‘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因只有寥寥八字，以致后人对它的理解颇有出入。正因如此，向来讲《说文》籀文，往往范围很窄，专指重文中有明确标示的那一部分。不过从总体看，不同的只是小部分，大多数字是相同的。他们都没有收录草部末《说文》称大篆的五十三字。”¹⁷

三、《说文》中之或体研究

或体是《说文》重文中最数的一类，但是，历来对它的研究远远不如对《说文》中之

古文和籀文那么重视。清人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说：“《说文》之有或体也，亦谓一字殊体而已，非分正俗于其间也。自大徐本所谓或作某者，小徐间谓之俗作某，于是好古者概视或体为俗字，或微言以示意，或昌言以相排，是耳食也”¹⁸。许翰在《与王君蓁友论说文或体俗体》中说：“说文重文，于古文籀文奇字外，又有或体俗体者，皆以纪小篆之异文也。或体有数种，或广其义或广其声。广其义者无可议，广其声者则有古今之辨。此种盖不尽出自秦篆，而亦有汉人增益之者。……即此可明制字之先后，声音之变迁，要于六书之旨无乖，故许书录之。若以此遂疑为俗体，非矣。不惟或体非俗，即俗体亦犹之或体也。躬，俗作躬，时通行作躬也。先俗作簪，时通行作簪也。印俗作抑，时通行作抑也。推之他字皆然。汉人手迹，不复可见，书经传写，已失其真，惟碑版是当时真迹，而汉篆寥寥不足征矣。”¹⁹可见，他们都认为《说文》正篆与或体只是异文的关系，并没有正俗的区别。马叙伦于《说文解字研究法·说文或字》中对《说文》或体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类：“有即某字而省者、有不言省而实亦省者、某字省而或体不省者、有不言不省而实不省者、有得声之字同而得义之字变、有得义之部未变而得声之部变者、又有增初文而成或体者、又有初文不行而别用或体、又有或体见于仓颉史籀及壁中书。”²⁰。范进军在《大徐本重文初探》中认为：或体是汉人从古代典籍（不包括《史籀篇》和孔壁古文）中选出来、笔画简单而经常使用的一种字体。它和正篆的不同之处，是没有经过秦代“书同文”的规范，相同之处是在使用上具有和正篆相同的地位。从其来源看，明显地早于正篆²¹。

另外，《说文》中的“奇字”、“篆文”、“俗字”、“今文”、“引通人例字”、“引文献例字”等重文由于数量较少，历来对其研究的论著也不多。马叙伦在《说文解字研究法·说文奇字》中说：“奇字”为“古文”的特异写法。关于《说文》重文中的“篆文”、“俗字”、“今文”等，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²²、董希谦《许慎与说文解字研究》²³、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²⁴等书中虽然都有所涉及，但分析和论述都比较简单。

四、关于《说文》重文研究的几点结论

从《说文》重文研究的历史来看，清人以前（包括清代）的《说文》重文研究总的特点是注重考据。考索细致，校释既繁，发现也夥。这为近代《说文》重文研究做了不可或缺的微观研究工作。近人利用日益丰富的出土古文字资料比勘研究《说文》重文，在《说文》古文、籀文等重文的通行地域及时间上，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由于以往《说文》重文研究的逻辑起点还值得重新检讨，研究者没有来得及把“重文”这个文字学概念的定位弄准确，没有从《说文》重文与《说文》正篆这样的对应关系上去把握“重文”，研究“重文”。也就是说，只有在与《说文》正篆的相互对应关系当中，才有《说文》“重文”存在的逻辑前提。所以，今天的《说文》重文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是：其一，从研究范围上来看，对《说文》重文中的古文和籀文研究得比较多，对除此而外的《说文》重文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二，注重用历时比较方法去考察《说文》古文和籀文的来源，缺乏对《说文》重文共时层次上的结构分析，而《说文》中贮存的重文，其实是汉代文字学者对历史汉字进行的共时处理。其三，把《说文》重文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去研究的论著很少，例如，对重文与正篆的关系、重文与重文之间的关系、重文的结构类型及其特点等方面研究有待深化，有的甚至还是空白。

总之，前贤对《说文》重文比较多的是从微观的角度进行探讨，即只是从重文历史类型的特殊性出发来揭示部分重文的属性特点，基本上还没有来得及从重文体系出发，建立与正篆对照关系的坐标，在共时与历时的对比过程中来分析全部重文现象。而这些问题，都是今天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The Summary of the Study for Different Forms of Formal Seal Characters in *Shuo Wen Jie Zi*

WANG P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 China)

Abstract: Review and sum up the different forms of formal seal characters in *Shuo Wen Jie Zi*. The former experts only discovered part of the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orms using a narrow perspective. They didn't study them as a whole system. So they couldn't analyze the whole phenomena. That's where we want to further our study. That is to say, we will compare every formal seal character with its different forms, sum up their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induce the maturing regular patter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 Shuo Wen Jie zi; different forms; summary

收稿日期: 2003-5-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01JAZJD740007); 上海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 (01AYY004)

作者简介: 王平 (1958—), 女, 山东诸城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研究员。

-
- ¹ 参见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香港太平书局，1976年版。
 - ² 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第1页，上海古籍，1983年版。
 - ³ 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
 - ⁴ 王国维《说文所谓古文说》，第193页，《观堂集林》卷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⁵ 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卷6，中华书局，1959年版。
 - ⁶ 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说文古文》，第19页，香港太平书局，1976年版。
 - ⁷ 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 ⁸ 曾宪通《三体石经与〈说文〉古文合证》，《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 ⁹ 董莲池《十五年来〈说文解字〉研究述评》，《松辽学刊》1994第3期。
 - ¹⁰ 曾宪通《三体石经与〈说文〉古文合证》，《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 ¹¹ 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第156页《观堂集林》卷5，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¹² 同上。
 - ¹³ 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第187页，《观堂集林》卷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¹⁴ 容庚《文字学形篇》，转引自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
 - ¹⁵ 郭沫若《信阳市的国别与年代》，《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 ¹⁶ 赵卫《说文籀文研究》，文字学论丛第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 ¹⁷ 潘玉坤《籀文字数考索》，《古籍研究》，2002年第2期。
 - ¹⁸ 王筠《说文释例》卷5，第2页，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版。
 - ¹⁹ 王筠《说文释例》卷5，第229—230页，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版。
 - ²⁰ 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第24—25页，香港太平书局，1976年版。
 - ²¹ 范进军《大徐本重文初探》，《说文解字研究》第1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²² 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第18—2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 ²³ 董希谦等《许慎与说文解字研究》，第3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²⁴ 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第3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